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现代化视域下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方略

张　辉　吴　尚
(北京大学 经济学院, 北京 100871)

摘　要: 中国式现代化是对如何实现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这一历史性难题的时代性回应,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中探索出的重大成果。中国式现代化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决定了新时代新征程上必须首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立足发展阶段转变的新特征新要求,以新发展理念为科学指导,以新发展格局为路径选择,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这一实践路径的关键在于畅通经济循环,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堵点难点,协同发力使社会再生产过程持续顺利健康运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中国以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工作着力点,调整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解决城乡间、区域间、国内与国际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更为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经济循环;新发展格局

中图分类号:F1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23)05-0152-12

一、通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中国式现代化

自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现代化问题引起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心理学等不同领域中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由于现代化森罗万象、模式多样、进程复杂,其日益成为一个极具生命力与影响力的跨学科研究领域。① 但现代化的定义至今尚无统一定论。尽管不同领域不同流派的学者对现代化的阐释不尽相同,普遍认可的是,现代化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的一场全领域、深层次的巨大社会变革。这一变革过程肇始于西方。从词源角度来看,英文中"现代化"(modernization)一词衍生于"现代的"(modern)一词,最早出现于 1770 年。② 18 世纪后期,以蒸汽机动力革命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了西方现代化进程;19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初以内燃机和电气化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了第一次现代化和全球化浪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电子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代工业革命引发了第二次现代化浪潮。③ 在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历次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西方文明经历"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殖民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等发展阶段,生产力高度解

收稿日期:2023-02-15
作者简介:张辉,男,江苏盐城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路径与策略研究"(项目编号:18JZD029)。

① 钱乘旦:《世界现代化历程(总论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 页。

② 根据《韦氏词典》,形容词"现代的"(modern)最早出现于 1585 年,动词"现代化"(modernize)最早出现于 1716 年,形容词"现代化"(modernization)最早出现于 1770 年。

③ 洪银兴:《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涵和功能研究》,《求是学刊》2019 年第 2 期,第 91—98、2 页。

放,经济结构从农业向工业再向服务业转型,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①

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不是源于各类现代性因素积累之上对传统农业社会形成的内发结构性突破,而是源于西方的现代化浪潮席卷之下对超稳定封建社会产生的强制外力冲击。② 长期以来,中国古代经济规模稳居世界前列。根据麦迪森数据(见表 1),公元 1000 年、1500 年、1700 年、1820 年,中国 GDP 占世界比重分别达到 22.7%、25%、22.3%、32.9%,人均 GDP 分别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102.7%、106.7%、97.8%、90.0%。可见,在没有技术跃迁而突破"马尔萨斯陷阱"的传统农业社会,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差不大。然而,西方率先踏上了科技革命的快车道,并以坚船利炮轰开了封建中国的大门,打破了封建制度的穹顶。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陷入内忧外患、战火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苦难之境,"现代化"便成为仁人志士奔走呼告、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这一过程跌宕起伏、延绵至今,也尚未完成。

根据模式道路的不同,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可分为"资本主义近代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两大阶段。③ 在资本主义近代化进程中,不同政治力量轮番提出的救国方案均未能根本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困局。历史数据显示(见表 1),维新变法后的 1890 年中国人均 GDP 大幅下降至世界平均水平的 50.3%,到中华民国成立的 1912 年继续下降至 41.7%,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从战争中基本恢复的 1952 年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23.8%。上述探索的失败充分证明,一味复制模仿先发者成功捷径并非良方。中国拥有着迥异于西方世界的经济基础、政治国情与传统文化,并且要实现在外部力量冲击下后发赶超型的现代化,势必要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历史雄辩地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人民找到现代化的正确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截至建党百年 2021 年,中国经济总量已突破 110 亿元,中国 GDP 占世界的比重上升至 18.5%,中国人均 GDP 超过 10000 美元,中国人均 GDP 恢复至世界平均水平的 102.4%。中国人可以坚定而自信地"平视世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表 1　历史上中国经济表现同世界平均水平比较

数值＼年份	1000 年	1500 年	1700 年	1820 年	1890 年	1912 年	1952 年	2021 年
中国 GDP 占世界的比重	22.7%	25%	22.3%	32.9%	13.2%	8.8%	4.6%	18.5%
中国人口占世界的比重	22.1%	23.5%	22.8%	36.6%	26.2%	24.4%	22.5%	17.9%
中国人均 GDP 同世界平均水平(世界 = 100)	102.7	106.4	97.8	90.0	50.3	41.7	23.8	102.4

资料来源: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2021 年经济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人口数据来自联合国统计司。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成功推进的关键,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带领中国人民在实践中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认识的萌芽,源自对长期居于世界前列的东方大国何以落后于世界现代化进程而备受侵略压迫的反思。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如陈独秀、瞿秋白的思想中都饱含着探索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的真知灼见。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叶剑英等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多次提及军队、军制、武器装备现代化的问题。战争结束后,在以何立国的重大选择上,中国共产党人普遍将工业化等同于现代化,将其视为通往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

① 周文、包炜杰:《国家主体性、国家建构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基于西欧、美国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经验》,《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 年第 5 期,第 1—8 页。

② 袁红英:《新时代中国现代化的理论范式、框架体系与实践方略》,《改革》2021 年第 5 期,第 18—28 页。

③ 马敏:《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若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16 年第 9 期,第 28—40 页。

党的七大明确指出抗日战争结束后工人阶级的任务“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方向。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工业化建设的过程中,逐渐拓展形成“四个现代化”目标。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将“四个现代化”正式表述为“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并首次提出“两步走”的战略步骤:“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中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力争在二十世纪末,使中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申了“四个现代化”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将“社会主义现代化”明确为“全党工作的着重点”。不久后,邓小平同志从中国实际出发,将“四个现代化”目标具象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即“小康”。党的十二大明确“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同时强调党的工作重点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并正式使用“小康”的概念作为到 20 世纪末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之一。党的十三大提出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并结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提出了分“三步走”的战略构想。党的十四大归纳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路线方向。在我国已提前实现“三步走”中第一步和第二步的基础上,党的十五大将第三步战略目标具体化,提出了新“三步走”的战略部署,首次明确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党的十六大提及 21 世纪头二十年奋斗目标时,特别加入了“社会更加和谐”的美好愿景。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丰富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党的十八大明确了“一个坚定的结论”,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进一步提出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在内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要求“促进现代化各方面相协调”,“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命题。党的十九大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两阶段战略安排:“从 2020 年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 2035 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起点,党的二十大宣告“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一步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申了总的战略安排,明晰了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

回顾中国共产党探索现代化道路的百年奋斗史可以发现,其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内涵的认识日益深化、广博,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安排的部署日渐系统、详实,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的理解日臻精准、完善,力求逐步构建起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理论体系与知识体系。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在把握历史大势、认清历史规律的基础上,对如何实现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这一历史性难题,逐步形成了历史自觉、历史自信与历史主动。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

己国情的中国特色。”①中国式现代化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决定了新时代新征程上必须首要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从一般性来看,现代化过程内含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多体系全方位的大转型。经济现代化作为其先导与动力,为其他领域的现代化建设提供物质基础与技术保障。从特殊性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意味着必须充分释放巨大的人口规模优势,同时避免走贫富两级分化、物质主义膨胀、精神世界荒芜、牺牲自然资源谋求增长或依靠战争掠夺攫取财富的“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老路与歧路。因此,要以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强有力的物质技术基础,有效调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持续“做大蛋糕”的基础上“分好蛋糕”,开拓出一条“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新路。

既然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那么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科学内涵和实现路径便成为了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关键所在。已有众多学者从发展目标、发展方式、发展内容、发展结构、发展要素等诸多维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丰富内涵予以诠释。② 在复杂繁博的要求与路径面前,洞悉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义,需将其与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间的整体逻辑联系起来。新发展阶段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与现实依据;新发展理念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原则指导与行动指南;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发展的路径选择与战略基点。在新发展阶段上,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后,所导向的发展结果,必然是高质量的。

(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基础:发展阶段转变

在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我国经济呈现出供给不足、需求抑制的短缺经济特征。此时重点任务在于提高经济效益,特别强调经济增速。正如邓小平南方谈话所言,“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我国要抓住时机发展经济,“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③ 正是在这一时期,我国利用好全球化浪潮下相对友好的国际环境,把握住世界第三次技术革命以及全球产业转移所带来的宝贵机遇,利用自身庞大的低成本劳动力禀赋优势,从海外引进资金、技术、原材料等,以出口导向型战略深度融入国际循环,创造了经济腾飞的中国奇迹。在高速经济增长下,我国于1987年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于2000年超额实现总体小康目标,于2010年达到世界银行划分的上中等收入发展中经济体行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发生了明显转化。从供给端来看,供给总量不足的情况已根本改变,但供给质量提升任务依然艰巨。生产要素中劳动力低成本优势日渐削弱、资金充裕却大量重复投资或停留在金融体系空转、土地资源愈发紧张导致价格高企、生态环境约束趋紧等问题制约着经济发展的空间。更为重要的是,表征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也明显放缓,甚至跌为负值。从需求端来看,消费特征已由模仿型、排浪式单一化转化为个性化、多样化,投资空间已由趋于饱和的传统行业转向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固有优势渐显不足。这些趋势变化共同要求我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使发展方式由依靠高投入的粗放式向依靠技术进步的集约型转换。高质量发展意味着不能简单以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但这不等同于不考虑增长率。相关测算显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依然需要4%—5%的经济增长率予以支撑。④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义在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

---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求是》2022年第21期,第4—35页。

② 张占斌、毕照卿:《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研究》2022年第4期,第21—32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383页。

④ 刘伟:《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新增长目标与新发展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第5—13页。

理增长,这便要求在科学的发展理念指导下,调整发展路径,把握发展主动。

(二)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指导:新发展理念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发展理念必须随着发展水平、发展环境、发展条件的不断变化而适时创新。新发展理念正是党中央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精准把握世界潮流趋势的基础上,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的根本遵循。创新是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能够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而促进社会生产关系的调整,从而奠定更为坚实的经济基础,引领上层建筑的变革。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社会系统中各要素间必须保持优化组合,维系动态平衡与良性互动,才能以有序稳定结构推动经济发展。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人类社会是自然界的产物,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演替,在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现代化建设曲折探索后,最终达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化大生产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成就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必须以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赢得经济发展更充沛、更有效的外源动力。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人民始终是支撑发展的主体力量,共享才能实现经济社会各组成要素的良性互动,发展的成果理应惠及全体人民,这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切中所有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特征,之间各有侧重、相辅相成、融会贯通、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一个逻辑严密、辨证统一的有机整体。在实践中,必须应用系统思维,依照新发展理念的整体性和关联性进行设计。①

(三)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新发展格局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应对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与时俱进地提升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塑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改革开放以来,“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发展模式虽然是符合当时国际比较优势的应然之举,但也导致了我国经济内部未能建立起顺畅融通机制的现实之境。一方面,受制于改革开放前期内需市场的发育不足,我国生产体系的供给能力与国际需求紧密结合,承担全球价值链中的加工制造环节,国内生产能力的扩张主要满足于国际需求的增长;另一方面,过于依赖国际需求导致本土企业在海外市场上往往面临买方垄断,定价权缺失下难以实现产业的迭代升级,导致国内居民的消费升级需求又向海外溢出。在国际循环中我国既无法通过生产者驱动的链条学习核心技术推动工艺革新,也难以利用消费者驱动的链条获取营销网络促进品牌形成。所以我国虽然具有了“世界制造中心”的地位,但依然面临着“中低端锁定”的风险。原有的发展模式在全球政治经济局势良好且处于承接产业转移的机遇中,能够保证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但却不能保障我国经济的发展质量。当前,我国经济的供给端与需求端都存在规模化潜力,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丰富的人力资源、庞大的市场规模都可以转化为创新培育的沃土,但主要问题在于供给端与需求端的结构性错配。② 这便要求将经济发展立足点由国际转向国内,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有力促进自身核心技术的创新、工艺的提升、品牌的形成,以供给端革新创造、引领、满足更多新层次、宽领域的美好生活需求。同时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更为丰富的商品与要素选择以及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吸引全球优质要素资源在我国经济领域集聚,以此强化经济发展的效益与质量,从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物质之基与动力之源。

由实现现代化的历史夙愿出发,到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选择,到经济现代化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客观

---

① 张辉、吴尚:《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成效、问题及推进方向》,《学习与探索》2021 年第 12 期,第 93—102 页。

② 张辉:《更好统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经济研究参考》2023 年第 4 期,第 14—15 页。

要求,再到“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规划,呈现出如图 1 所示的整体关联。这一逻辑理路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注解与现实遵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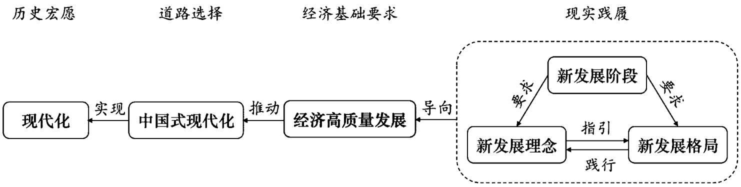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理路

三、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是构建新发展格局,而其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经济循环本质可理解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社会再生产”过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构成“社会再生产”这一有机整体的四个环节,体现着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经济循环需要从总体联系出发,以问题为导向发掘并解决生产、分配、流通(交换)、消费各环节的主要矛盾与重点问题。①

(一)生产环节:筑牢制造大国优势,推动创新引领产业升级

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②。就生产与消费间关系而言,表现出同一性。产品的生产过程同时也是人类劳动与物质资料的消费过程,而产品用于个人生活的消费过程又同时是人类再度创造自身劳动能力的生产过程。生产创造出消费的对象,决定消费的方式,引致消费的动力。我国生产体系的优势在于具有完备的产业链条及超大规模的制造能力。我国目前拥有 41 个工业大类、207 个工业中类、666 个工业小类,在世界 500 种主要工业品中有超过 40%的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下强大的物质生产能力是我国经济具备强大韧性和潜力的关键所在。然而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的问题依然存在,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问题。一方面,在现行全球分工体系中发达国家对核心技术、营销网络、利益分配格局的垄断势力,造成我国对产业链高端技术、高端环节的掌控力不足。我国工业的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的对外依存度较高。另一方面,我国存在固有优势的产业链中低端环节也面临着全球化深度调整时期产业链回流与外迁、产业布局区域化与多元化的冲击。

二是产业结构优化问题。配第—克拉克定理表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增加值占比、劳动力占比的重心将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再向第三产业转移。我国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自 2006 年达到峰值 47.6%后进入下行通道至 2022 年达 39.9%,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则稳定增长至 52.8%,呈现出产业结构升级的特征。但需警惕的是,效率失衡下的“去工业化”趋势。相关测算显示,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已较长时期低于第二产业,但与此同时,我国第三产业产值在 2012 年也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这意味着资源配置正在由高效率产业向相对较低效率产业流入。③ 这同时也说明,制造业内部各行业间的效率提升与三大产业之间的转型升级,以及生产要素在其间的有效配置,依然任重

---

① 谢富胜、匡晓璐:《以问题为导向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社会科学》2022 年第 6 期,第 161—180、208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0 页。

③ 张辉:《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产业结构演变趋势研究》,《新视野》2019 年第 4 期,第 5—14 页。

道远。

三是创新成果产业化问题。尽管我国专利申请数量不断攀升,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已连续四年全球第一,但专利转化率仍处在低位。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数据显示,我国发明专利产业化率在逐渐提高的基础上也只达到 36.7%,其中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 48.1%,而科研单位、高校的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仅为 13.3%、3.9%。这是由于,一方面,以市场为导向的科技创新管理体系的缺位,造成部分专利转化价值本身就较弱;另一方面,保障创新成果权利归属和权益分配的相关法律政策仍不健全,造成部分专利转化难度增大。大量专利发明后便被“束之高阁”,成为创新推动产业升级的掣肘。

上述问题可归结为关键领域自主创新不足与资源配置效率有待提升这两大痛点。因此要把握好生产的决定性作用,必须坚持创新核心地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有效制度供给、技术供给、产品供给,切实提升国内生产体系对国民日益丰富多元的消费需求的适配性。

(二)分配环节:推动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完善收入分配结构

分配包含生产要素的分配与劳动产品的分配,其中生产要素的分配内含于生产过程之中,并决定着生产的结构,而劳动产品的分配体现为生产要素分配的结果。“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地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①,即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同时,分配也反作用于生产,以及社会再生产的其他环节。合理的分配方式与分配格局对于激发劳动者积极性进而增强生产效益,提高人民可支配收入进而释放消费潜力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分配格局从宏观来看体现为国民收入在企业、政府、居民部门间的配置转移,从微观来看体现为收入在不同居民个体上的分布。在宏观中,劳动报酬份额尤为值得关注,其对生产效率的影响表现为以下多种渠道综合作用的结果。从供给端来看,劳动报酬份额的提高内含实际工资水平的上升,会刺激劳动节约型技术的创新,进而由资本深化提高劳动生产率,②同时劳动报酬份额的提高还会提高劳动者积极性,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从需求端来看,劳动报酬份额的提高意味着利润份额的下降,前者通过消费促进总需求,后者通过投资抑制总需求,总需求效应取决于上述力量的角逐,③进而通过生产率增长的需求驱动机制(卡尔多—凡登法则)④产生影响。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由“出口—投资驱动型”向“内需—创新培育型”转化,劳动报酬与生产率的互动机制愈发重要。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投入产出流量表,我国的劳动报酬份额在近三十年中呈现出“U 型”变动趋势,劳动报酬占增加值比重由原本稳定在 55%左右快速下降至 2007 的 41.36%,而危机后又回升上涨至 2020 年的 52.10%。⑤ 因素分解显示,“行业内部效应”是驱动我国劳动报酬份额“先降后升”演变的主导因素,多数细分行业内的劳均工资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之间的相对快慢关系在国际金融危机前后发生了逆转,尽管经过了一段时期的上升,我国各行业的劳动报酬份额与新兴市场国家平均水平大致相当,但仍明显低于发达国家。⑥ 因此,在合理调整生产关系基础上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是畅通经济循环,提升经济增长动能的重要一环。

---

① 《资本论》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998 页。

② Adalmir Marquetti, *Do Rising Real Wages Increase the Rate of Labour -Saving Technical Change? Some Econometric Evidence.*, Metroeconomica, vol.55(4), 2004, pp. 432-441.

③ Amit Bhaduri & Stephen Marglin, *Unemployment and the Real Wage: The Economic Basis for Contesting Political Ideologie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4(4), 1990, pp. 375-393.

④ Nicholas Kaldor, *Causes of the Slow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 Inaugural Lec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1-40.

⑤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投入产出流量表。

⑥ 冯明、闫冰倩:《我国劳动报酬份额“U 型”演变两阶段的驱动因素研究与国际比较》,《统计研究》2022 年第 6 期,第 117—131 页。

在微观中,居民收入差距可通过影响需求的规模与结构进而引致创新,一方面,收入差距的扩大,缩小了具有购买力的人群,进而削弱了新产品的市场规模,抑制了创新活动的产生;而另一方面,收入差距的扩大,提升了高收入群体愿意支付的价格,激励了创新活动的产生。①“市场规模效应”与“价格效应”的权衡使得居民收入差距与研发创新呈现“倒 U 型”关系。② 当前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在 2008 年达到 0.491 的峰值后,缓慢下降后停滞不前至 2021 年为 0.466,但整体仍处于高位。因此,要特别重视收入差距对创新活动产生的“市场规模效应”,着力缩小城乡间、区域间、同一地区内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提升低收入人群收入,扩大中等收入人群比重,推动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由“葫芦型”转变为理想的“橄榄型”,从而充分释放收入分配对需求引致创新的激励作用。

(三)流通(交换)环节:建设高效现代流通体系,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流通本身只是交换的一定要素,或者也是从交换总体上看的交换”③,这意味着流通是以商品或要素交换为前提,在整个社会层面形成的接连不断的交换行为体系。流通(交换)是联通生产与消费的中介环节,直接包含在生产之中,由生产所决定。流通(交换)也可反作用于生产。生产的发展能提供更好的交通运输等物质条件及更高效的社会组织形式,从而有利于提升流通效率;而流通效率的提升有利于加快资本周转速度,进而有助于更快地集聚资本从而为生产发展提供条件。

在经济循环中流通涉及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就商品市场而言,近年来我国国家骨干流通网络逐步健全,流通领域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但是物流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比重偏高一直我国物流行业被广泛提及的问题。2022 年数据显示这一比率为 14.7%,是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的近两倍,与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印度相比也不具显著优势。当前我国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存在着“东强西弱”“城强乡弱”“内强外弱”的问题,各类运输网络间协调衔接有待提升,特种物流领域亦存在短板。这便要求现代物流体系建设高度适配生产体系发展与消费需求升级,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以数字化、自动化、网络化、智能化提升物流服务效能。

就要素市场而言,在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不同要素领域表现为不同方面问题。在土地市场中,突出表现为政府与市场、地方与中央、城市与农村、各区域间的权责界定不清、利益分配不均、流转机制不畅,这导致了土地价格扭曲、供需错配,进一步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助推力量。在劳动力市场中,突出表现为旧编制管理体系下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不充分,户籍制度下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均等,劳动者权益保护法规程序尚不完善下劳资关系的不对等,这制约了劳动力在市场信息引导下的合理自由流动,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在资本市场中,突出表现为长期以来金融监管与风险防范体系不健全,有效金融服务供给不足,这造成了我国房地产金融、互联网金融等领域的野蛮生长,资金难以有效流向实体经济领域,进一步放大金融脆弱性风险,加剧产业结构性失衡。在技术市场中,突出表现为跨部门跨区域不同创新主体间协同合作的创新网络建设仍在探索阶段,技术交易市场仍在发展初级阶段,规模小、布局分散、信息不充分、渠道不成熟,这削弱了创新扩散效应,制约了创新成果转化效率。在数据市场中,突出表现为各部门、各地区间的“数字孤岛”与“数字鸿沟”现象,这削弱了数字经济发挥效能的空间,同时带来数据垄断导致“强者恒强,赢者通吃”的隐忧。上述种种问题凸显了要素市场化改革对我国畅通经济循环、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重要意义。这便要求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方向,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因事制宜地破除阻碍要素流动

---

① Reto Foellmi & Josef Zweimüller,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Demand-Induced Innovations.*,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73(4), pp. 941-960.

② 孙巍、夏海利:《居民收入分布与产品技术创新——需求引致创新理论与实证检验》,《经济科学》2022 年第 3 期,第 50—64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第 39 页。

的体制机制障碍,建立有序有效的新制度新规范新渠道新平台。

(四)消费环节:立足人民丰富需要,释放内需市场潜力

消费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的实现环节,它使得生产过程最终完成。消费的实现程度与速度深刻影响着社会再生产的顺畅程度与运转速度。生产受到消费的制约,消费能力的增长带动市场规模的扩张,引导着生产体系的发展。消费在观念上创造出新的生产需要。国际经验表明,国内市场需求是本土企业从事自主创新的激励源泉。而创新是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因此内需市场规模稳步扩大、消费结构优化升级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的基点。

自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内部结构调整与外部冲击共同推动着我国经济发展由外需拉动型向内需驱动型转变。2009—2019 年间净出口对我国 GDP 增长的贡献率年度平均为-5.06%,而 2014—2019 年间消费连续 6 年超过投资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支撑力量来自于我国庞大人口基数下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然而若干梗阻导致这一规模化、多元化的消费需求潜能未能有效发挥。从消费需求总量来看,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但是我国居民消费占 GDP 比重长期处于低位,2021 年数据显示这一比率仅为 38.2%,明显低于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平均水平 45.8%。这一比率可分解为“居民可支配收入/GDP”与“居民消费/居民可支配收入”之积,前者代表居民享受经济发展成果的比例,受到宏观中国民收入在企业、政府、居民部门间分配的影响;后者代表居民总体消费倾向,是我国总体消费规模与人口规模不匹配的重要来源,与微观中我国居民收入/人口分布呈现出的“葫芦型”格局密切相关。这一分配格局意味着全体居民在收入上的分布形成为两个众数组,收入水平低端的众数组人口比重大,收入水平中高端的众数组人口比重较之小。① 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最高,但消费能力无法支撑;中等收入群体具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与较高的消费能力是消费的中流砥柱,但在总人口中占比不足;高收入群体的消费边际倾向低,且高端消费容易向海外溢出。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目前我国居民总体消费倾向偏低的现状。

从消费需求特征来看,我国居民的消费偏好呈现出以下典型转变:一是服务性消费占比稳步上升,由以生存型消费需求为主向发展型和享受型需求不断升级;二是消费方式持续创新,由以线下消费为主转向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发展;三是消费内涵日益丰富,由追逐低价转向追求品质。当前我国城乡居民主要耐用消费品多类型的拥有量已接近饱和,居民消费的动机从对量的满足转向对质的追求。在前一阶段,模仿型排浪式消费吸引生产进行复制性扩张,造成了企业创新意愿弱、产能过剩、品牌培育不足。而在当前及以后的长时期中,个性化、多样化消费赋予了企业更强的创新动机,同时也要求生产体系更先进、更高效,要求流通体系更经济、更安全,才能真正将观念中的消费意愿转化为经济中的消费行为。

因此,要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把握好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不能囿于消费一方,需要从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协同发力。要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完善分配制度,为消费扩容提质提供根本保障;要提升生产体系和流通体系建设质量,创新消费业态模式,促进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发展,提高文旅、医疗、教育、养老、家政等服务的可及性和均等化水平,促进共享经济和新个体经济发展,积极培育绿色低碳消费市场,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选择空间。

四、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顶层设计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党的二十大报告在部署经济领域建设任务时,要求“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

① 陈宗胜、康健:《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葫芦型”格局的理论解释——基于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和结构的视角》,《经济学动态》2019 年第 1 期,第 3—14 页。

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作为重要工作方向与政策着力点。①

(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一项重大实践创造,它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教条,有力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时激发了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是助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腾飞的关键力量,也是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有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坚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持续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积极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形成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良性竞争、相辅相成、有机互补、协同发展的新格局。要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全面推进政府“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充分发挥超大市场规模优势,引致自主创新。要增强宏观经济调控效能,以中长期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科学把握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整体关联,遵循系统性、平衡性、协同性设计财政、货币、科技、产业、消费、就业等政策,维护平稳健康的经济发展环境。要更好结合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高效调集全国优质资源于关键领域,形成聚合协同的优势;充分发挥市场的激励作用,优化研究方向与技术选择,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形成自主创新的有效路线。

(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产业体系是经济体系的内核。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充分发挥生产在经济循环中的决定性作用、强化创新主体地位的必然要求,是“两个大局”下掌握经济发展主动权的关键一步,是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一方面,发挥好新型科技举国体制优势,加快补齐我国在基础零部件、基础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软件、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等领域的短板弱项;另一方面,把握好新科技革命的机会窗口,积极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绿色低碳循环经济等关键领域的增长引擎。要夯实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动交通、能源、水利等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前瞻谋划 5G 基站、千兆光网、数据中心和云计算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的系统布局,充分发挥基础设施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要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在以技术进步和人才培养提升生产率、以体制机制改革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我国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能力、完整高效的供应链体系、优势互补的产业集群等优势,巩固制造业核心地位,提升服务业发展质量,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

(三)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我国是一个农业文明历史悠久的国家。“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历程中关乎全局、攸关成败的关键性问题。尽管我国已经历史性消除绝对贫困,但农业基础不稳固、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等问题依然是社会主要矛盾的集中体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是实现现代化的重点环节。因此,要以乡村振兴筑牢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根基。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扎实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一方面,以耕地和种子为关键,以技术升级为抓手,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另一方面,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推动农业产业链延伸,促进农商文旅体结合,形成特色农产品深加工、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子商务等新增长点,有效拓宽农民增收渠

---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求是》2022 年第 21 期,第 4—35 页。

道,持续强化脱贫攻坚成果,增强农业农村内生发展动力。要大力推动美丽乡村建设,完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改善农村人民居住环境,解决农村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健全乡村治理体系,让广袤乡村成为宜居宜业的美丽家园。要强化乡村人才支撑,一方面,实施新型职业农民、乡村干部、乡村科技人才等培育工程,栽培本土人才;另一方面,制定有效激励机制和柔性引进人才管理办法,吸引外来人才,为乡村振兴提供智力支持与动力源泉。

(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禀赋差距大的国家,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长期客观存在且必须妥善解决的问题。只有在因地制宜地形成各地区间的合理分工与良性互动的基础上,才能统筹全国资源要素高效配置,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系统性、协同性动力。要以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系统布局。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尊重经济规律与自然规律,深入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统筹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科学利用、严格保护国土资源,逐步形成包含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生态功能区在内的三大空间格局,牢牢守住城镇开发、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生态保护三条控制线,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要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与区域重大战略,持续完善支持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的政策体系,持续增强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三大增长极的新动能,持续打造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绿色发展的新典范,持续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雄安新区的高水平建设,形成各区域因地制宜、高效协力、相辅而行的区域经济发展新布局。要坚持以人为核心,深入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以都市圈、城市群为依托,以产业发展为内核,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引力,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外溢效应与辐射作用,破解“大城市病”,推动中小城市发展,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助力乡村振兴,形成工农互促、相得益彰、共同繁荣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五)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我国是一个在开放中谋发展的发展中大国。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随着发展阶段的转换,原有的发展模式已经不能保障发展的质量与效益。要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增添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外源动力。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要充分发挥规模化优势,凭借我国完备的生产体系,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技术与运营管理经验分享,带动更多中国商品、中国品牌、中国企业“走出去”;依托我国广阔的市场空间,吸引“逆向创新”研发机构落成,将先进生产技术、人力资源和管理经验“引进来”。要稳步扩大制度性开放,推动国内基本制度框架和管理体系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进一步健全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有序扩大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期货等金融领域开放,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水平,努力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吸引全球优质要素资源在中国经济领域集聚。要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与世界各国建立起良好的伙伴关系和牢固的利益纽带,持续向国际社会提供包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在内的重要公共品,推动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促进中国与世界共享繁荣发展。

结 语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对如何实现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这一历史性难题,逐步形成了历史自觉、历史自信与历史主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得以萌发、探索、开辟,并成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决定了新时代新征程上必须首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即立足发展阶段转变的新特征新要求,以新发展理念为科学指导,以新发展格局为路径选择,将经济发展立足点由国际转向国内,解决国内供给端与需求端的结构性错配问题,强化创新主体

地位,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而这一实践路径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在生产环节,要筑牢制造大国优势,推动创新引领产业升级;在分配环节,要推动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在流通环节,要建设高效现代流通体系,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在消费环节,要立足人民丰富需要,释放内需市场潜力。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辩证关系表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我国以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作为工作着力点,调整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解决城乡间、区域间、国内与国际间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更为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The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Strategy of China'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zation

Zhang Hui, Wu Shang

(*School of Economic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s a major achievement made through exploration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PC) in its great practice of leading China's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in response to the historical dilemma of how to realize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line with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The generality and specialty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determine that on the new journey in the New Era, we must first and foremost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 ourselves on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and requirement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stage, and promote the economy to achieve effective improvement in quality and reasonable growth in quantity, with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as the scientific guidance and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as the path choice. The key to this practical path is to smooth the economic circulation. We should concentrate on breaking the blockages and solving the difficulties in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circulation and consumption, and work in concerted efforts to make the social reproduction process continue to run smoothly and healthily.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a systematic project. Focusing on constructing a high-level system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building a modernized industrial system,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an all-round way, driving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advancing high-level opening-up to the outside world, China will adjust its production relations, develop productivity, solve the problems of unbalanced and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mong various regions, and betwee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s, so as to lay a more solid material and techn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comprehensive construction of a socialist modernized country.

Key words: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conomic circulation;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责任编辑　郭昌盛)